

来华非洲留学生校外聚居区协同治理研究^{*}

——以 Z 大学周边社区为例

徐 薇 麦晓晴 廖思傲

【内容提要】新时期的中非合作、交往交流面临很多新问题和挑战，特别是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中国基层社区的国际移民治理提出了更加严峻而紧迫的挑战。本文基于对来华非洲留学生校外聚居社区的实地调研，呈现来华留学生在社区中的“悬浮”状态以及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中对境外人员的管理模式，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结合本次公共危机的考验，提炼具有新时期中国特色与优越性、可操作的基层社区境外人员治理新方案。

【关键词】非洲留学生；社区治理；境外人员管理；协同治理

【作者简介】徐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人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区域国别学、非洲人类学；麦晓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比较研究专业硕士；廖思傲，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讲师（金华，321004）。

在习近平总书记“真实亲诚”对非理念政策的指导下，中非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来华非洲留学生数量亦创新高。2018 年来华非洲留学生总数为 81562 人，同比去年增加 9.86%，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

^{*} 本文系 202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海外聚居点调查研究与动态数据库建设”（23&ZD20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集体成果，在此感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2019 级、2020 级硕士生张玉婷、张书林、刘文桐、刘晴、董锐的调研。

16.57%。^①以Z大学为例,全校共计留学生(长短期)3000余人,其中非洲学生有1700人左右,占比为55%~60%,来自非洲50余个国家。^②随着来浙留学交流的非洲学生与日俱增,围绕非洲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亦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

本文聚焦Z大学周边社区里的非洲留学生及其与社区的互动,出于建构自我、社会与情感空间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来华非洲留学生选择居住在校外,直接催生了Z大学周边非洲留学生社区的产生。然而,中国的基层社区准备好接纳在肤色与文化上有巨大差异的非洲留学生了吗?与此同时,在语言和对当地文化价值认同上存在较大适应困难的非洲学生,有融入中国社区的需求与意愿吗?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流动产生严重影响,也给基层社区治理防控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对外国人,我们有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吗?在全球化与移民化时代,积极提供基层社区治理服务与进行创新实践,帮助诸如非洲留学生等境外人员融入中国社会已然成为基层治理主体和参与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 在华非洲留学生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和对外教育合作与交流工作的不断深入,加之之中非关系的日益紧密与升级,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对中非人文交流的日益重视,非洲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在逐年增加,规模在不断扩大,^③成为来华留学生群体中一道亮眼而独特的风景。然而近年来,有关来华留学生的负面报道频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议,非洲留学生出于肤色等原因在人群中具有“高识别度”,并且数量众多,很容易引起各界关注。李安山、沈晓雷就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过系统的梳理与思考,^④蒋华杰从政治身份认同视角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在华非洲学

①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4月12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3-14。

② 数据来源于Z大学国际处,访谈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

③ 李安山、沈晓雷:《非洲留学生在华:历史、现实与思考》,《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61~89页。

④ 李安山、沈晓雷:《非洲留学生在华:历史、现实与思考》,《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61~89页。

生的“退学现象”。^①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从互派留学生的单一形式发展到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新阶段。^②在新时期,需要建立双边合作交流机制,加强中非留学生交流。^③与此同时,在非洲留学生教育培养方面存在认识度不高,品牌、特色不明显,经费资助渠道单一,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④在非洲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上,大多数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各种因素。^⑤事实上,非洲留学生在当地语言与当地文化价值观上都存在较大困难,^⑥在专业学习和人际交往上也面临挑战,^⑦中非学生的时空观与家庭观的差异在跨文化活动中带来了误解与冲突。^⑧由此,对来华非洲留学生的管理给高校带来了难题,高校与留学生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缺乏其信息的持续跟踪与反馈,非洲留学生时常处于被动管理状态。^⑨随着非洲留学生数量的逐年增长与其活动范围的扩大,管理主体也应呈现多样化,而不再仅仅只局限在学校。除了留学生在校管理与学业适应性问题,留学生的校外生活以及逐渐形成聚居区所带来

- ① 蒋华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华非洲学生“退学现象”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2期,第52~62页。
- ② 贺文萍:《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西亚非洲》2007年第3期,第13~18页。
- ③ 楼世洲、徐辉:《新时期中非教育合作的发展与转型》,《教育研究》2012年第10期,第28~33页。
- ④ 程伟华、董维春、刘晓光:《非洲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年第8期,第54~58页。
- ⑤ 参见孙茜《“一带一路”背景下非洲在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33~136页;吴燕萍:《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习适应研究》,《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44~47页;陈秀琼、龚晓芳:《来华非洲留学生跨文化学业适应调查与分析》,《教育评论》2018年第9期,第55~59页;肖嫻、张长明:《非洲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与对策》,《高教学刊》2016年第15期,第9~10页。
- ⑥ 易佩、熊丽君:《非洲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水平实证研究》,《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364~368页。
- ⑦ Ismail Hussein Hashim et al., “Cultur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iving Stressors: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African and Western Students at Chinese Colleg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Vol. 26, No. 5, pp. 795-799.
- ⑧ 叶帅:《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时间观、家庭观方面的跨文化对比研究》,《科教文汇》(上刊)2011年第10期,第30~31页。
- ⑨ 曹洁、闫妍、李薇:《文化管理视角下的非洲来华留学生管理问题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年第4期,第233~234页。

的挑战开始受到关注。郑江华等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洲留学生的管理实践提出了对高校外国留学生社区系统的管理,^①然而非洲留学生必然与校园以外的社会有所接触,在此过程中,社会各界的参与显得尤其重要。事实上,针对非洲人聚居区与社区治理模式,学者们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此处不再赘述。2007年全国第一个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②在广州设立,其作为信息联网的一部分,起到了更精细地对外国人进行管理、降低外国人主动或被动参与犯罪比例的作用;同时,它也向外国人提供信息与服务,帮助他们适应中国生活。^③与此同时,非洲留学生作为来华非洲籍外国人的一部分,也催生了非洲留学生校外聚居区这一稍有特殊性的社会空间,这也带来了中方大学对留学生管理模式的转变——传统上中方大学对来华留学生家长式的管理接待模式逐步转变为监督注册和信息收集,而公安、社区等学校外的部门则更多地加入共同管理中。^④我们可在外国人社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聚焦非洲留学生校外日常生活与基层社区国际移民管理实践,积极探索来华非洲留学生聚居区的社区管理道路。

近年来,有学者逐渐关注非洲留学生社会生活。S. A. 卡基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着重研究了喀麦隆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与生活。在田野调查期间,作者居住在浙江师范大学附近的社区,并将这些空间视为非正式交往的重要场所。^⑤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对这个社会空间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与互动进行深入分析。事实上,中国基层社区里的非洲留学生群体研究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这与不同规模、发展阶段的城市建设紧密相关。比较而言,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里,因为房租成本高,非

① 郑江华等:《高校外国留学生社区系统管理的构建——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洲留学生的管理实践为例》,《职业技术教育》2013年第23期,第66~68页。

② 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是直接由街(镇)级分管政府成立的,主要职责包括:对辖区内外国人居住情况和涉外机构的摸查,提醒外国人到期办理临时住宿登记,发现过期未办理签证或属于“三非”的外国人及其他可疑人员时,立刻通知当地派出所进行处理。服务站还会将所有涉外人员的基础数据录入电脑,实施对外国人的信息化管理。

③ 周博:《在华非洲人管理新模式:广州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29~134页。

④ 赵芸:《外国留学生社区管理模式探析——以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留学生聚居区为例》,《辽宁警专学报》2013年第5期,第54~57页。

⑤ Severin Aleance Kaji, “Student Migration from Cameroon to China: Government Rhetoric and Student Experience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ologne, 2022, p. 43.

洲留学生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区,多数仍选择住校或分散在城郊相对便宜的社区里,隐匿在茫茫人海中,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较小。然而在一些中小城市中,比如笔者所在学校——位于浙江省中部小城的JH,因其周边城中村的快速发展,很容易形成留学生群体聚居区,进而给基层社区治理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本项研究即对非洲留学生与基层社区治理关系的调研与探讨,笔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非洲人中的留学生群体,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接纳非洲留学生的基层社区为了适应新的发展与需要而采取的主动介入与治理办法,一方面客观描述非洲留学生在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详细介绍基层社区与属地公安为了配合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留学生管理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举措,进而对于我国高校与社区对留学生群体的治理与服务提出“接地气”“有实效”的治理经验与政策建议。

二 田野点概况及其形成溯因:自我需求与有限供给

本文以Z大学非洲留学生校外三大聚居区(Q、G、L)为田野点,采取参与观察、质性访谈、问卷统计等方法对三大聚居区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由于Z属地公安分局于2018年建立了“六方协作机制”(Z大学、街道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①、房东和志愿者),笔者调研时直接参与式观察了来华非洲留学生校外聚居区的形成过程以及相应机制实践的发展。

三大聚集区均分布在Z大学主校区周边,都与校园只有一路之隔。Q社区位于Z大学东面,当年居住中国居民1942人,居住留学生153人,其中非洲留学生有138人,占留学生总数的90.2%;L社区位于Z大学南面,当年居住中国居民8621人,居住留学生136人,其中非洲留学生126人,占留学生总数的92.6%;G社区位于Z大学北面,当年居住中国居民3291人,居住留学生126人,其中非洲留学生89人,占留学生总数的70.6%。^②是什么原因促使大量的非洲留学生从校内公寓搬到校外城中村出租屋呢?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归纳为以下两点原因。

^① 含Q社区境外人员服务中心。

^② 此段数据均来源于属地公安内部,采访时间为2021年3月4日。

（一）保持母国的生活习惯，寻求更为舒适的居住体验

根据访谈我们得知非洲留学生虽喜欢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但不意味着认可多人集体公寓，相反受访的大多数留学生喜欢拥有私人空间，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与母国居住环境相似度较低的中国集体宿舍生活。“很多人在来中国之前都没有试过和同学一起住，同时我的室友只会说法语，而我的母语主要是英语，沟通也不方便”；^①“到了晚上我们不能在自己公寓里大声说话，要求必须早点回到宿舍，这让我难以接受”；^②“宿舍太小了，床也太小了，我们和中国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③“我每周都要做礼拜，而学校不可以进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④“留学生住在校外社区的最大原因是避免在公共环境中进行宗教性的行为”。^⑤

公寓空间与管理、宗教信仰需求（主要指伊斯兰教）、食宿起居习惯均与非洲留学生的期待相左，导致大量非洲留学生选择居住在校外。我们无法否认趋同化管理下的中国高校已经在力所能及地为留学生创造良好环境，然而非洲学生的个人需求和期待与学校管理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更向往拥有能够追求个人自由的校外住宿空间，因此便出现了非洲留学生在找校外房子时强调最多的是“大的、新的、干净的”等要求，这一点校外租房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意图建构有一定认可度的社群归属空间

非洲留学生校外居住不仅能够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慢慢建立起具有一定认同感的社群归属空间。在出租房里，非洲留学生在宗教、社交、情感上的刚需得到了满足，“我可以铺上地毯，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私人的环境里做礼拜，邀请我的朋友分享食物与故事，可以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⑥在社区进行田野调研时，非洲留学生常有“我喜欢这里，这里让我很舒服”等诸如此类的评价。当问及聚居区的名称和方位时，因Q社区背靠高速公路，非洲留学生便自称住在

① C，非洲留学生，2020年9月28日，田野访谈。

② X，非洲留学生，2020年10月3日，田野访谈。

③ W，非洲留学生，2020年10月3日，田野访谈。

④ C，非洲留学生，2020年9月28日，田野访谈。

⑤ Y，留学生辅导员，2020年11月18日，田野访谈。

⑥ L，非洲留学生，2019年5月30日，田野访谈。

高速路,为自己贴上“高速路人”的标签。甚至他们还对社区辅警开玩笑说:“你不是高速路人,因为不住在这里,你不是我们的人。”^①命名与属性认可的背后是非洲留学生族裔文化集群的集中体现,通过寄寓空间和聚居区社交实践,相似移民社群的强化让其获得一种异乡的精神寄托与归属感和信任。

三 来华非洲留学生日常生活状态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本土社区中建立起自己的社区边界,接纳同族裔一起居住生活、产生联系,但并没有很好地嵌入中国社会中,反而在个人空间、情感、体制上形成“舒适区”,“悬浮”在出租屋—本地社区中,与周遭的社会生活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本文将以 Q 社区为例深入探讨非洲留学生在本土社区中所处的具体位置,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Q 社区总占地面积 12.5 公顷,以 1956 年组成 Q 高级社而得名,村中心位于三个自然村的交界处,占据社区高地,也是该社区物理空间上的中心点,居委会与境外人员服务中心也坐落于此;户籍人口仅有 1200 人左右,且留守老人、儿童居多;社区内仅有三间小商店、两家小饭店、一个固定菜摊,许多人家在门前小地种上了蔬菜,由于社区人口较少以及相对自给自足,社区内尚未形成集市。社区居民把社区分为新村和旧村,旧村向村中心聚拢,农民工大多租住在旧村;而新村指的是环绕在旧村外围的区域,非洲留学生则大多租住在新村。在社区住了两年多的社区留学生志愿者说道:“喜欢住在这边(新村)是因为安静,楼与楼之间没有那么挤,还有小公园,比较舒服,这里的房子也大一些,在非洲,我们的房子都比较大,而且空旷一些,太挤了就不太习惯。”^②来到中国后,非洲留学生在居住环境中寻找与自己家乡的相似性。同时,由于旧村房子密集,路窄且岔路多,社区内的小商店和菜摊都位于社区外围,不同的新村片区间可通过村子外围通到大路。如上所述,由于住房要求、新旧村空间分布以及缺乏进入社区核心区域的需求,留学生的活动

① Z 大学外的 Q 社区和 G 社区都毗邻高速路。

② A, 喀麦隆人, 2019 年 6 月 4 日, 田野笔记。

空间基本局限在社区外围。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上,非洲留学生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机会与本地社区及社群产生联系,这种有限的交流让非洲留学生与当地居民都生活在各自的日常话语与想象中,“外国人”与“房东”成为他们各自的代名词,两者在互相谈论时常常强调“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由此,非洲留学生组成了一个“悬浮”在Q社区中的“高速路”社区。首先,Q社区在日常生活中是自给自足的,除了出租房屋,几乎没有与非洲留学生产生其他交易行为,而且许多房东都为家中留守老人,只有当出现纠纷矛盾时,年轻人才可能回来处理。社区缺乏与非洲留学生互动的土壤,居民与留学生交流缺位。其次,该地社区居民刻意划分自身与非洲留学生的居住空间,角色更接近于提供长租房宾馆的经营者。本地居民非常在意自己的出租行为是否影响自己在社区里的生活以及和邻里的关系,比如不少房东向笔者表示自己是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之前是住在一起的,但后来还是发现不住在一起好。一位房东谈道:“我平时都不愿意进来的,租给他们半年了,就他们太吵的时候我来过两三次,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进来!……我就只签三个月的合同,不行的话就让他们搬走。”^①事实上,本地社区对接纳非洲留学生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既希望留学生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但同时也与他们保持距离。

非洲留学生则在自己内部建立起社会网络,其中心一般是来自同一国家的同胞,但由于非洲留学生来华目标相对于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留学生更单纯,群体更稳定,^②群体内部人与人互动频次较低,深度也较浅,使得其聚合性较低。虽然非洲留学生聚居区尚未发展成熟,但笔者认为非洲留学生已经在本地社区中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共同体,并且在这个共同体范围内处于“悬浮”的生活状态,“高速路”成为非洲留学生悬浮在中国实际生活情境之上的浮板。他们在空间、市场、社交、时间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有一定的距离,与社区日常生活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

^① P, 房东, 2019年6月11日, 田野笔记。

^② 在调研期间,笔者遇到许多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留学生,他们的来华目标除了学习以外,还要从事跨国贸易,他们常说选择N大学的原因之一是离货源集散地近,方便拿货。而且与大多数非洲留学生独自一人来华不一样,阿拉伯留学生往往有家属遍布广州、佛山、义乌、山东等地。

非洲留学生之间有内部交易市场,每当毕业生回国前,会在有着几百人的非洲留学生微信群里发布出售信息;也有留学生中途回国后再次来华时,便会带上当地特有的香料专门出售给非洲留学生。一位留学生安迪曾经向笔者展示500毫升的矿泉水瓶里装着的红色液体,“这在喀麦隆卖两块钱,但是来到中国就要45块,虽然很贵但是这是一道喀麦隆菜的必需品,只能由喀麦隆人带过来”。^① 值得一提的是,安迪受中国外卖行业迅速兴起的启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做起了外卖,他做了一张海报,上面除了菜品的图片外,还有微信和支付宝的付款码;笔者参与了他创业的过程,外卖群从只有几个人发展到现在有200多人,但笔者发现外卖群里几乎都是非洲人。我们不难发现非洲留学生在与实践中国发展经验,但其日常生活却没有嵌入中国社会,仅仅是群体内部的互动。非洲留学生自发举办的聚会与活动,几乎没有见到过中国人的身影。笔者第一次被邀请到一场几十人的非洲留学生烧烤聚会时,其他非洲留学生见到笔者时无不感到诧异。此外,非洲留学生常常用Facebook、WhatsApp等在母国常用的社交软件与父母、朋友保持联系,关注发生在非洲大大小小的事,对中国本地新闻却极少关注。

在与非洲留学生和社区居民的访谈中,关于“时间”上的区隔总是会被提起,留学生“悬浮”的生活状态还反映在时间感上,他们往往生活在“非洲作息时间”里,社区居民常常抱怨“主要是我们有时差,他们经常大晚上的还不睡觉”。而非洲留学生认为在非洲大家都这么晚睡的,即使吵到别人了,他也不能责怪,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与学业方面,非洲人更愿意慢下来享受“悬浮”的生活,普遍存在“过客”心理。在与诸多非洲学生的交流中,笔者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有“叶落归根”和“回乡创业”的想法,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有土地,他们想回国工作,服务自己的家庭与国家,相信自己的母国有更好的发展才是出国大学生应该有的心理状态。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以及当前的移民环境——相比较其他传统的移民国家来说——并没给旅华非洲籍人士灌输非洲完全没有发展希望的观念,而欧美国家传统移民研究中大规模背井离乡式的移民案例实际上是饥荒、战乱、社会动荡下的产物,并不值得推崇。而且事实上,这种对传统大家族的依赖和对故土的执着,与中国人对“家与根”的信仰并无二致。

^① A, 喀麦隆人, 2019年6月19日, 田野笔记。

四 基层社区境外人员治理的有效探索： 以六方协作机制为例

在一定程度上，非洲留学生校外住宿是走进中国社会的重要方式，留学生聚居区逐渐形成。社区内非洲留学生与本地居民之间由于文化、生活习惯等差异引起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也出现了房租等经济上的纠葛。各管理部门间留学生管理信息不对称，针对留学生共同管理体制机制缺位，基层社区管理人员缺乏相关培训，同时，缺乏外籍人口权益保障与社区服务。越来越多的投诉，如治安、安全、卫生等问题促使派出所、学校、居委会等各方对此做出反应。2018年3月Q社区创新六方协作管理模式，建立境外人员服务中心，构建网格化布局机制，旨在形成共享共治的互动局面。

首先，就境外人员服务管理问题，落实学校、公安局、街道办、社区（村）居委会、出租房东、境外志愿者六方职责（见图1）。一是警—校联合管理：公安局进行基础信息采集与住宿登记管理，与学校互通留学生校外群体活动、涉案等信息；学校建立留学生底册，及时更新签证信息并通报公安机关，对留学生采取“网格化”管理，上门走访检查，宣讲中国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做到校内不松、校外不散。二是发挥街道办与社区（村）居委会基层支撑作用，同时为留学生提供服务，做好服务管理保障工作：街道办加强社区境外人员管理站建设，开展出租房屋星级评定与消防安全监督；社区（村）居委会成为房东村民与非洲留学生之间的中介，做好一线落实工作，及时向公安机关、街道办报告相关工作。三是出租房东与境外志愿者配合治理主体的管理服务工作：出租房东配合另五方主体，明确对自己出租房屋的各项责任，如出租房屋登记，协助流动人口住宿登记等；留学生志愿者发挥翻译员、宣传员作用，帮助境外人员更好地融入社会管理。

其次，建立境外人员服务管理六方协作机制配套制度，构建留学生网络化管理模式，打破条块分割、被动管理的局面。一是六方协商机制，分析学校校园内及周边不稳定因素和街道范围内境外人员底数变动，对校园安全、风险隐患进行评估，及时调整各方工作安排。二是建立信息传递机制，以单线传递和小范围共享的方式为主，重要情况第一时间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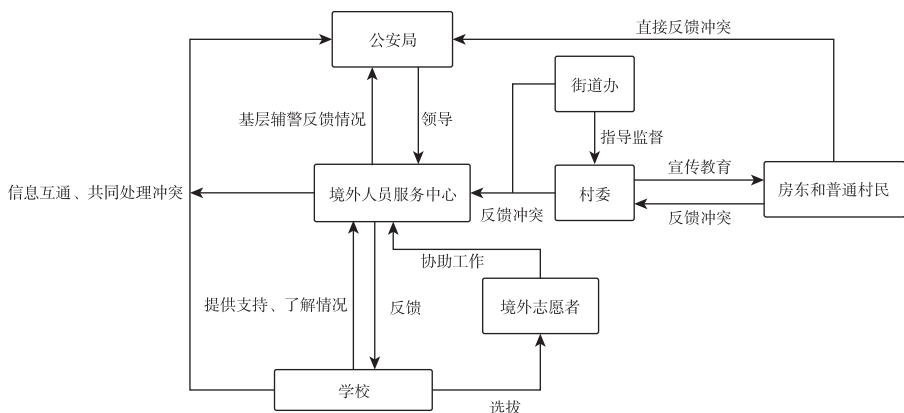


图1 六方协作机制

递。学校留学生管理负责老师告诉笔者：“以前就是各管各的，对于学校来说，可能就突然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这个学生怎么样了，因为什么事情被抓起来了，被处罚了，中间没有沟通，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避免的，现在我们通过六方就可以协商嘛，它的核心在于信息的互通，每年我们都会将（留学生）报到以后的数据和派出所进行核对，他们要核对外国人的出入境情况，我们也要核对，比如说留学生住在外面的情况等等。”^①三是六方协同管理机制，2019年5月下旬，笔者参与由民警（流动人口协管员）、街道社区干部、学校老师、留学生志愿者等多方组成的清查小组，对Q社区内的外国人居住登记情况、出租房硬件设施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对留学生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六方各司其职，是成功的协同管理机制落地的具体案例。四是考核奖惩机制，提高各方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尤其激发了街道综治办对社区（村）居委会的领导与激励。笔者在境外人员服务中心多次遇到上级部门来视察，甚至来自外省市的官员来参观学习，居委会书记表示：“街道有综治办的呢，他要查是查得进来的，他们属于我们的上级部门，这个就是有组织，上级对这里是高度评价的，而且我们是一线的，上次在派出所里（讨论）如何加强管理六方，这个要搞一个更加完善的。”^②可见，基层社区在各方推动下有活力有动力进行基层社区境外人员治理探索。最后，针对因基层工作人员外语能力不佳而出现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或出于对涉外法律不了

① X，学校留学生管理负责人，2019年6月18日，访谈笔记。

② S，居委会书记，2019年6月19日，访谈笔记。

解,应建立教育培训机制与留学生志愿服务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用。

与此同时,利用科技与大数据分析的力量,引进出租房屋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为精准化服务管理出租房屋流动人口引入智慧门禁,提高了治理的整体信息感知能力和精确度。通过智能门禁境外人员信息录入功能,管理人员可上传境外人员护照信息、居住信息、走访日记等。笔者通过走访调研以及访谈公安局、学校等相关人员后发现要充分利用智能门禁系统仍面临挑战,如居民贪图方便不关门的现象常有发生。

学校、公安部门、街道办、社区(村)居委会、出租房东、境外志愿者等在社区开启六方协作机制,形成一套牢固且多方协作的管理网络模式。在应对矛盾冲突时,在六方协作机制下,政府、公安机关、教育部门联手对留学生进行网络化管理,已然形成应对机制和管理网络,各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笔者观察的其中一例房东投诉留学生扰民的案例进行分析,2019年6月11日,某房东家老太太来到境外人员服务中心向基层辅警投诉自己家的留学生房客多次半夜吵闹,经过反复劝阻,留学生仍然我行我素;同时老太太还与居委会干部反映此事;随后笔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出租房,当时房东不愿意再租给他们,但留学生表示合同未到期而且很喜欢这间房子,不同意搬走,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尝试再次磨合,留学生答应如果再次吵闹打扰到房东休息,便会马上搬走。7月房东多次投诉留学生扰民,社区工作人员与辅警多次劝说无用,决定上报学校,学校随即联系留学生,经过教育与疏导,留学生搬出该出租房。可见,冲突矛盾解决过程依托境外人员服务中心实体平台,社区工作人员和辅警作为一线人员首先协调处理冲突,并根据事件性质以及事态发展,及时上报学校或公安局。

作为六方协作机制的实体——境外人员服务中心除了配合各方管理外,还为社区内的留学生提供出入境登记、住房信息登记服务。按照公安局规定,外国人在抵达中国24小时之内须办理住宿登记,原本只能在公安局办理,设在社区内的境外人员服务中心则大大方便了外国留学生。服务中心在留学生签证到期前一个月通过电话或者上门走访时提醒其尽快办理新签证,避免出现因没有留意签证日期而出现逾期居留的情况,同时留学生也无须因此而被罚款。此外,该中心免费为非洲留学生提供租房信息,为留学生租房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Q社区针对境外人员创新六方协作机制是基层社区境外人员治理的有益探索,尤其是在留学生校外管理与服务方面提供了一条

可供借鉴但仍需不断完善的治理之路。

五 从“悬”到“融”的突破：公共 危机下的转圜与协同

非洲留学生在社区中的“悬浮”状态因新冠疫情暴发而有所改变。疫情之下，Z 大学周边非洲留学生所在的社区形成了一个更为紧密的社会生态。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地毯式排查，测量体温、核查身份、查明行迹，开展集中隔离和配套服务工作，原本仅靠房租维持单一“户主—租户”关系的房东们也开始主动向留学生了解具体生活情况以及是否需要帮助等。高校介入后他们须每日上报信息，并接受线上教学与心理疏导，各类聚居区治理主体也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与防疫政策教育。在此过程中留学生志愿者这一基层聚居区治理者的重要属性也得到彰显和放大。留学生志愿者加入了属地公安“六方协作”战疫志愿者行列，除了每天在村口排查出入人员，还要协助走访境外人员，做好语言翻译和宣传工作，志愿者在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①2023 年初，Q 社区经历了拆迁，随着聚居在这里的非洲留学生亦迁移到附近的其他社区，境外人员服务中心搬迁到 Z 大学北面的 G 社区，在 Q 社区形成并实践的治理机制仍旧实行。

在中国采取严格的联防联控举措期间，六方协作机制使得治理主体对留学生的关注达到了顶峰，从而“介入”了聚居区中非洲留学生的生活学习，彼此的交流互动逐渐打破了“悬浮”的界限。随着各方的“介入”，尽管是在疫情防控时期开展的被动式治理，但客观上为非洲留学生和聚居区治理者们提供了全新的相互接触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治理者们的信息沟通与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协作，联防联控也为六方协作机制提供了实践检验与机制完善的可能性。随着联控举措的改变，已经过时间检验的治理制度得以保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以人为本，迅速地在效率和人性化管理方面改进、优化。

在疫情期间对非洲留学生走访时，可以看到由于疫情外出不便，他们被迫宅在家里，学校和社区为其提供了基本食材，他们在家制作食物、

^① L，聚居区工作民警，2020 年 9 月 27 日，田野访谈。

上网课、做礼拜以及在不断切换的 App 中保持着和家人、亲友的联系，夜晚时分在社区里活动，可见其内部社交网络依旧能够满足其需要。2020 年 5 月疫情防控常态化后，非洲学生相继回归课堂，学校与出租房的“两点一线”恢复如初。但疫情中，非洲学生与外界的情感联系明显加强，房东不仅放宽留学生交纳房租水电的期限，还和居委会一同为非洲学生赠送自家种植的蔬菜^①或让专门的配送人员代买生活用品；学校也每周和留学生见面，送去牛奶等生活必需品、当时短缺的防疫用品以及留学生自身需求的物品。^②

事实上，当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共同的“敌人”时，疫情的暴发和防控政策的执行让非洲留学生与聚居区之间形成了一种粘连式相处形态，他们保持自己原先的习惯与特性，但与民警、社区人员、房东、学校开始产生除单一契约型关系外的联系，他们被要求跟中国人一样，做同样的事、获得同等的待遇——境外归来或从高风险地区回来须隔离、有限制的出行以及信息上报。对非洲留学生而言，他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绝对真空的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当中，^③他们实质上相当于获得了某种同等的社会身份与认同。社区中不再以中国人或非洲人来区分每个个体，而只有未外出人员与外出归来须隔离人员，除此之外，二者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互动，齐心抗疫、共克时艰的情感驱动，使之呈现一种相比之前黏性更高的交流状态，但我们仍要清楚地认识到社区尚未完全实现从“悬浮”转到“融合”的社交模式。

本文充分肯定 Z 大学、周边社区及属地公安在面对境外人员治理这一新问题、新难题时所做的努力和创新性举措，特别是 Q 社区先行先试的“六方协作机制”在疫情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赞誉。^④然而我们也要了解，“悬浮”的生活状态是高校非洲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时普遍存在的状态。从校内到校外，看似是留学生通过校外住宿而进行在华社会化的过程，但实际上，经历了刚开始的在华生

① Z 大学位于城市与农村的交界处，周围的社区几乎是从农村演变而来的，居民有自家种植蔬菜的条件。

② Z & F，两位留学生辅导员，2020 年 9 月 27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田野访谈。

③ 邱昱：《清洁与危险：中-尼亲密关系里的去污名化技术和身份政治》，《开放时代》2016 年第 4 期，第 88~107 页。

④ 金剑科、陈美青：《金华婺城公安：打造高校现代化治理新样板 境外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六方协作”》，《浙江法制报》2020 年 11 月 9 日，http://zjfb.zjol.com.cn/html/2020-11/10/content_2730977.htm?div=-1，最后访问时间：2021-3-14。

活困境后,面对房东、学校、外国人登记等“规矩”,非洲留学生“顺势”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顺从”规矩,在个人空间、情感、体制上并未嵌入中国社会情境中,相反在出租屋—本地社区中形成“悬浮”社区,追求自由舒适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可用来解释其他有着较强自身文化传统的人群在异国他乡与主流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相互转化交织的复杂状态,而这些人所处状态的强弱程度既取决于所在国家结构制度设计上对他们的包容与接纳程度,又受到个体能力差异与主观能动性的影响。

六 反思与建议

直接面对非洲学生的社区在探索辖区内境外人员治理道路时,建立了多元完备的多方协作治理网络,积极“介入”留学生的管理中,但对治理对象缺乏深入了解,甚至对非洲留学生有一种“不得不管”的消极情绪与偏见,非洲留学生在看似“完备”的治理网络中缺乏落脚点,因此也被架空在治理网络上,进一步加深了其“悬浮”的程度。如何打破“悬浮”状态,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以及基层社区,发挥好非洲留学生在中非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呢?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面对非洲留学生等跨文化治理对象,应继续落实学校、公安局、街道办、村(居)委会、房东、志愿者等六方甚至司法局、外事办、信访局、团委等多方主体责任,将多元治理主体点进行线性联结从而形成平行治理面,深度淡化传统基层治理的权力特征,补齐科层制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短板,突破信息孤岛,变治理信息与资源的上下传达为多元治理主体共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共管共服务的“聚居区治理共同体”,从机制结构上最大限度地解决自上而下垂直型治理模式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形成内外大小循环联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协同式治理结构。

第二,促进社区“内外循环”与社交网络的缔结,激活参与主体的能动性。探索建设聚居区内部自组织和治理网络,建立聚居区包容型社会信任和开放型社会网络。^①支持建设聚居区矛盾调解中心、社区跨文化

^①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87~104页。

组织,自下而上地促进聚居区治理水平提升,形成能“自主”“自为”的聚居区自我支持系统以及资源信息获取和利益表达机制。^①同时促进“外循环”,形成非洲留学生校内管理方与校外服务方的治理合力,建立校方、警方、社区方等多方信息共享库,建立长效沟通交流机制。发挥非洲留学生的同辈治理优势,以外管外,壮大留学生志愿者队伍规模;建立非洲学生的吸纳通道,吸纳非洲学生参与村(居)委会等相关组织,实现聚居区对非洲学生吸纳的结构性覆盖,支持建成非洲留学生聚居区生存与跨文化适应融合的资源支撑网络。

第三,将协同治理思想贯穿始终,重视来华前到离华后的非洲学生全过程教育管理工作,牢牢把握非洲留学生意识形态管控高地,校警合作加强舆论引导。实现全方位深度管理,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建立治理主体信息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开发留学生管理服务App,在重点区域建立人脸识别系统,提升身份核查、轨迹感知、风险预警能力,提升常态化与突发公共事件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实施全过程“数智”深度管理。

第四,建设内涵式聚居区文化,开展丰富多样的聚居区文化活动。通过组织中国传统文化节等中非文化交流项目,开展非洲学生与中国居民交流融合的活动;继续加强“海外学子走进古村落”等留学生社会实践,为留学生了解本土自然与文化提供机会,深化“家+”模式。此外,校内外各方要注重对非洲学生协同开展跨文化心理辅导,以及为其提供就业指导,引导其正确理解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与中国文化,使之成为真正的中非文化使者。

总之,本文针对中国高校周边非洲留学生聚居区的个案研究,特别是通过比较新冠疫情前后非洲留学生的不同状态,力图充分展示非洲留学生在校园之外的日常生活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服务意识与积极应对举措。这些努力和尝试一方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构建多元一体的新型国际社区,在交往交流中打破语言文化上的隔阂,消除各自的刻板印象,从而推动共筑中非高水平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沈玉宁

^① 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会》2007年第2期,第159~169页。

China-Africa Women'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History,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Zhang Liping, Liu Hongwu / 224

Abstract: Women's exchang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which has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soun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as been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refore, we conducted a historical study on China-Africa women'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since 1940s, finding that struggling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is the early exchange topic. To the tim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turned to supporting African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ir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Women's exchange has been expanded in both breadth and depth and become institutionalized by FOCAC, and focused on the capacity building among African women. To build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and further deepen China-Africa women'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hina and Africa should strengthen planning to promote institutional building, strengthen research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expand platforms to consolidate relationships, and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Africa women'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Women's Exchange; Historical Study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Off-campus Community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Take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Z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Xu Wei, Mai Xiaoqing, Liao Siao / 242

Abstract: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the new era face

many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particular, the COVID-19 outbreak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poses a more severe and urgent challenge to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s primary level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the off-campus community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uspension"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mmunity and management mode of overseas personnel in China's primary leve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ombined with the test of the COVID-19, extracting a new management scheme for overseas personnel in primary level commun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periority and operabil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frican Students; Community Governance; Management of Overseas Personnel;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